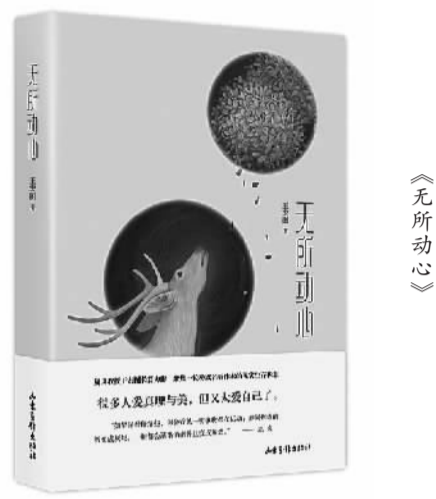


◎创作谈

在中外文化交融中求索

王宏图



《无所动心》

《无所动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是我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作家徐生白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徐生白在文学界拥有盛名,读者和他自己都认为,他正处于创作的巅峰状态。可是当他访美归来后,却突然发现自己枯坐电脑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似乎一夜之间江郎才尽了,心绪颇为烦乱。他在《庄子》等书中寻求精神慰藉,力求在纷乱的世界中达到无所动心的境界。在查出患上癌症后,徐生白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再也不能像之前所想象的那样生活于无所动心的“理想状态”之中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哥哥,他没有一件事可以置身事外……

乍看之下,这是一部反映当下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但主人公徐生白已不是生活于单一的文化环境中,而是游走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场域里。这在全书伊始便有体现,徐生白在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后,坐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候机楼里,准备搭乘飞机回国。这是一幕典型的他在旅途的场景,而且是在跨国跨文化的旅途中。此外,全书下半部分在相当多的篇幅中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这不为整个作品涂抹上了一层浓郁的异国情调,也为展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真切的舞台。

从精神气质上看,《无所动心》的主人公徐生白与德国大作家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脉相承之处。歌德塑造的这一人物源于中世纪德国的民间传说。浮士德尽管学富五车,但书斋中沉闷的生活使他生机全无,他渴望到屋外的广阔世界信马由缰。魔鬼梅菲斯特乘虚而入,允诺赋予他常人没有的魔力,重温青春的激情,建功立业,阅尽人间春色,条件是他必须把灵魂抵押给前者。浮士德喝下魔汤后恢复了青春,历经爱情、政治、事业的悲剧性体验,最后豁然开朗,发现了人生真谛:人必须每日每时地追求幸福与自由,随后才能享受幸福与自由。虽然依照契约,魔鬼收走了他的灵魂,但上帝鉴于他的虔诚,派天使从梅菲斯特手中救出他的灵魂,引领其踏入天堂。

相比之下,徐生白自然没有浮士德上天入地、穿越古今的传奇经历和宏大气魄,但就其不囿于原有的生活状态,不倦地拓展自己的生命边界,不停地叩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点上,与浮士德不谋而合。屈原《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功名成就后,徐生白尽管生活优渥,但种种外界的纷扰使他心境难以平静,他力图通过阅读古籍、操练气功让自己的心境臻于无所动心的境界。随后,罹患癌症和家庭的一连串变故使他身心俱疲,他在情爱的海洋中游弋,想借此寻觅人生的幸福,但最终陷入凶险的漩涡而无力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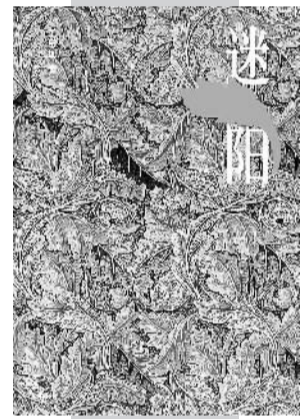
徐生白这一形象的孵化既与我日常对欧洲文学的研读有关,又与我的工作履历密不可分,它是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产物。2007年至2009年,我曾在德国汉堡的孔子学院工作,其间亲身经历了许多书本上无法获得的跨文化交流体验。我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别了,日尔曼尼亚》便是以那段在德国的生活经验为蓝本创作的。新作《无所动心》后半部分一些主要人物都在那不勒斯和邻近的卡普里岛登场。我之所以能将异国背景融入书中,与我2019年在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为期三周的访学经历有关。没有那段经历,许多细节根本无法臆想出来。

虽然《无所动心》从人物设计和场景安排上带有异域文化的色调,但它同样蕴含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品在结构上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全书20多章都以《易经》中的卦象冠名,各个卦象间联结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暗示着人物命运的走向和情节的趋势,这大大丰富了小说文本的意蕴和内在的张力。《易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原。尽管它是一部占卜书,但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的话来说,它内蕴的占卜理性以形态学为基础,关注零散事件间的关联。尽管忽视了因果链,但其聚焦的众多图形的组合变化,对应着无穷无尽、新变选出的宇宙天地间的整体变化。《易经》中的64种卦象是对外部现象世界无穷偶合抽象化后的模型,借此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秩序与法则。这一貌似神秘的古老智慧在大数据年代有可能获得新生。虽然工具和手段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但当代的大数据和占卜的相通之处在于,不去深究现象世界背后的因果链条,而是在浩繁的表象中寻找相关性,展示大千世界的潜在秩序。大数据理性的这一“返祖”现象为《易经》中古老卦象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契机。

而将《易经》中的卦象符号运用到文学作品的文本中,我的做法是通过它们内在的符号关联,喻示文本潜在的意蕴与结构——这成了中国古老传统在当代的复生。更有趣的是,《无所动心》并不是纯粹由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标题来源于古希腊语的词汇“不动心”(ataraxia),它是斯多葛哲学的术语,意指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超脱境界。而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类似的概念,道家推崇的“真人”同样站在了这一众人仰视的位置,“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淮南子·精神训》)

文学作品是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无所动心》这部作品本身成了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它同时也寄托了我的思考——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能与新时代文化的潜力何在。

(作者系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宏图部分著作书影

在泰国,有一群华人诗歌从业者,他们不断将目光投向祖国,以绵绵的痴情和炽热的情怀,用诗歌抒发内心对中国的爱恋。他们就是泰国“小诗磨坊”的诗社同人。

2006年7月1日,在林焕彰和曾心策划下,泰国“小诗磨坊”诗社成立,由曾心担任召集人,成员包括岭南人、曾心、林焕彰、博夫、今石、杨玲、苦觉、莫凡八人。这一沙龙式的诗歌俱乐部,于一座六角凉亭成立。凉亭位于召集人曾心新落成的“小红楼”庭园中,奠定了诗社活动轻松雅致的氛围。诗社的活动形式是在固定场所不定期集会,以创作六行以内的小诗切磋诗艺,并探讨小诗文体的美学和理论问题,以期扩大影响。成立以来,“小诗磨坊”成员不断扩大,晶莹、温晓云、澹澹于2013年加入,范军、杨棹于2017年加入,2020年又增加一位新成员张永青。

现代诗歌中的小诗文体,发展至今约有百年。自上世纪20年代冰心、宗白华等开创并引领小诗创作以来,这一文体呈现出由外向内、由动到静、从学习借鉴西方诗艺向以印度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诗歌借鉴的发展历程。百余年来,小诗的文体现范众说纷纭,有主张十四行以下的,也有倡议仿制西方二行诗,甚至还有严格要求不多于三行的。但不论哪种主张,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小”。

“小诗磨坊”同人承续中国新文学诗歌传统,抓住“小”做文章,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诗人、诗歌评论家龙彼得评价说:“他们心目中的小诗最多六行,再长不得超过六行。他们的写作有一种自觉的约束力,这使得笔下的作品在诗思上更集中、在结构上更严谨、在文字上更精审。”比如苦觉的诗句,“朝阳把夜吃掉了/墨池里游动着我的鱼”,明暗动静之间,仅仅两句就将喜欢画竹的他“早晨画竹”时的感悟简洁勾出。体物善思、玄悟得理,“磨坊”里的小诗往往是诗人们从生活与生命里“磨”出来的句子。

当然,具体到每首诗,最终是几行,一行内是否分句,又如何分节,则是诗人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来确定的。在“再长不得超过六行”的前提下,行与节上,每行使用的字数上,皆没有统一的硬性要求,宽严之间,自然制造了相对整饬又摇曳多姿的风貌,仅仅从视觉上考察,这已是一种不变中有变的审美诗体。

都说诗歌是有情的文体,“磨坊”小诗更不例外。泰国华人对于华文写作的坚持,源于他们对文化血脉的念念在兹,中国是他们情感深处的根与魂所在。“磨坊”里的诗人们,大多岁岁不轻,这种眷恋也就更集中而深沉。曾心自言,“华侨华人老了,总喜欢在梦里寻找自

泰国『小诗磨坊』——华文文学世界的一座凉亭

李良

己的故乡”,一首《故乡路》写尽诗人的乡愁:“自从有了甲骨文/便有用文字铺成的路 不管它有多长/只要回头沿着走/就能找到自己的故乡”。而梵君的《故乡》则小而直接,“故乡/是卡夫卡的城堡 欲进不去/想出出不来”,写尽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挂念不舍。亲情、爱情等人间真情在博夫、今石、莫凡等人笔下也有上佳呈现。

“小诗磨坊”的诗作之所以独具魅力,其原因在于做到了“咫尺之间见万里之遥”。粉米米出,面粉自麦来,他们诗歌中的“营养价值”是从“磨坊”里“磨”出来的。诗人们咀嚼意象,反过过滤,锤炼字句,从而磨出具有文学性的情和理。

近年来,诗社每年在曼谷举行新书发布会、专题演讲等活动,深受好评。“小诗磨坊”诗社成员多是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会员,在该会支持下,诗社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在泰国曼谷、中国南京举办“‘一带一路’与泰国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国际小诗暨小诗磨坊作品研讨会”,推进了小诗文体的探索与传播。成立16年来,“小诗磨坊”成员的诗作及探讨性理论文章,在泰国、中国等地的报刊杂志发表,同时,诗社每年出版《小诗磨坊》一卷,从未间断。

“小诗磨坊”的诗人们忠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自觉努力实践着小诗文体,传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的血脉深情,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主编)

书写人性深处的温暖与光亮

周聪

吴洲星的儿童小说《宝桃的村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讲述了宝桃在父亲病重之际,与母亲一起扛起家庭重担,直面生活中种种困难的故事。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书写了山乡百姓人家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充满温情与希望、善意与美好,这恐怕也是其入选今年9月“中国好书”榜单的原因。

小说中,“药”是重要的叙事动力。小说中大多与药材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对于宝桃、豆生两家而言,药材是谋生的重要手段,宝桃的爸爸、豆生的爷爷不断走向红莲山,挖药材养家糊口。而药材也给他们带来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宝桃父亲在挖药材时受伤,只能通过更珍贵的药材“灯台子”来治病;而豆生的爷爷则为采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是他的妻子礼婆无比珍视灯台子的原因。在礼婆眼中,丈夫的生命与匣子里珍藏的灯台子是合为一体的。除去宝桃、豆生两家外,康大叔一家以收药材为生,红莲山的药材经过康大叔之手得以走向市场。康大叔是宝桃父亲的好朋友,他们因药材而结下深厚友谊。

在我看来,《宝桃的村庄》中闪耀着人性之光,那是人与人之间最为难得的情感互动。豆生是宝桃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善良男孩。他急宝桃之所急,于是有了“偷窃”一节中为宝桃父亲偷灯台子的举动。豆生对宝桃的帮助还体现在卖豆腐上,当宝桃羞于在人群中招揽生意时,豆生帮她战胜了心中胆怯,让她能够大方地补贴家。豆生身上的善良、友爱、乐于助人等精神品

格,给了困境中的宝桃温暖和希望。与豆生一样,茂林叔也充当了救助者的角色,对宝桃家给予照拂,只不过他是以成人的面目出现。

小说的高潮部分是礼婆拿出灯台子,给宝桃爸爸治病的情节。作者生动描写了人间真情融化礼婆心中坚冰的过程。对豆生爷爷拿命换来的灯台子,礼婆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当别人索要灯台子时,她自然是直截了当地拒绝。礼婆的儿子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受伤,宝桃母亲为他献血,挽救了他的性命,礼婆内心的坚冰开始慢慢融化。在“洗澡”一节中,礼婆终于突破了内心的藩篱,拿出了灯台子,给了宝桃爸爸痊愈的可能,给了宝桃一家希望。

儿童文学是有难度的叙事,它要沟通作者的成人生活经验与目标读者的少儿生命体验。在《宝桃的村庄》中,作者不仅厚植乡土生活经验,更在曲折动人的故事中灌注了真切的生命感悟,相信会与小读者产生较强的心灵共鸣。



◎新作评介

“自然之子”的灵魂独唱

钟倩

作家冯秋子的最新散文集《时间的颜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本颇具自由探索精神的跨界作品集,融散文、绘画为一体,给人以思想启迪与视觉冲击。作家在书中呈现的形象,既是冷静的观察者、虔诚的体验者,也是进击的探索者,她笔下的彩墨画与有静气的文字,互相映照,相得益彰,犹如来自内蒙古草原的灵魂独唱,唯美、纯粹,在读者心头漾出层层叠叠的暖意。

身为编辑和艺术家的冯秋子,借回归自然重新认识自己。书中收录的《过去是怎样活在今天的》《纪念,为了什么》是纪念诗人苇岸的文章,当自然文学渐热,苇岸被符号化为“中国的梭罗”,我们能从作者这里得到一份清醒与理性,回到诗人的家乡,看到这位自然写作者的成长脉络。反观自身,冯秋子也是如此真实和坦荡,她的精神世界中涌动着生命源头的召唤,荒原、草籽、风沙、马头琴、牛群羊群,额娘、敖包、蒙古长调、白音布朗山,它们中内蕴着游子对家人的牵挂、对家乡的眷恋、对故土的义务。时间久了,这些情愫郁积成



结,生长为一首歌,如她在全书开篇《生长的和埋藏的》一文中情不自禁的启唇而唱。这声音时而是音符,和着她的舞姿;时而是色彩,涂抹在纸上风景;时而是独语,浇灌成思想之树。因此,她腕底流淌的文字,与抽象的彩墨画、曼妙的舞姿,构成了多声部交融的精神交响曲,简约、动感、富有张力,又兼具思想的柔韧性和艺术的感染力。

批评家张莉说:当代女性散文写作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内心隐秘持续开掘的“内窥镜式”书写,另一种是边地或边疆视野的表达。显而易见,冯秋子两者兼具,书中着墨最多的是舞者的独白。身为编剧和舞者,她与人合作创作的现代舞《生育报告》远远于其在文学领域的声名,但却是她最宝贵最珍视的一段经历。作者奉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为座右铭。所谓悲伤,是拥有大悲悯和大宽容,参透生命和人性后依然能永葆清澈、坚韧和美丽的心。让舞者同时是更为深邃的思想者,这是冯秋子孜孜不倦的精神航向,她眼中的舞者是这样的——“他们发现、发掘、探求、描

车祸高位截瘫坐在轮椅上的作家张鲁,还是采访京郊山区特大洪灾受灾村民张秀莲,作家感同身受,用爱与温暖传递向上的信念,给人以发自肺腑的感动。

“人可以做的还有,就是去灌溉。人拥有的自由,说到底,其实只有思想和灌溉。”思想和灌溉,赋予作家以人格尊严,也是创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冯秋子深谙这个道理,她做编辑,是用心用情型地、画画,是想画在灵魂里窜动的东西,想画我发现的东西、思想的东西”,所以书中的插画像一棵树凝视另一棵树那样专注;她跳舞,思想变成流动的海洋,跟着血脉一起汹涌澎湃,使她的生命得到滋养。正如她的自白,“我的血是北方那个草地里蓄养出来的,这使我有气走路,有力气看见圣洁灵魂的时刻,感到亲和与温暖,感到安详与宁静。”思想的舞者,把艺术当成了宗教,分明是用生命烛照生命,这是一种精神修行。

合上书本,脑海中浮现出书中的一幅幅画作,耳畔回响起蒙古族长调的动人旋律,我的内心趋于安详。我由此感慨,所有的写作在高处都是献给大地的颂歌,冯秋子自由切换在文学、舞蹈、绘画三者之间,或沉醉,或清醒,或游离于边缘,却总能保持独立不羁,向内纵深开掘的姿态——这是“自然之子”的灵魂独唱,也是拥抱自然的孜孜以求。